

宁波文化研究工程·历史名人研究

明代余姚 吕氏家族研究

张萍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明代余姚 吕氏家族研究

张 萍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 / 张萍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308-09978-3

I. ①明… II. ①张… III. ①家庭—研究—余姚市
IV. ①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6870 号

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

张 萍 著

责任编辑 吴伟伟 weiweiwu@zju.edu.cn

文字编辑 杨利军

封面设计 俞亚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20 千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9978-3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第一章 文献名邦:姚江人物甲天下	(1)
第一节 底蕴深厚的余姚历史文化环境	(1)
第二节 姚江望族 文化世家	(3)
第二章 位极人臣:奠定“传家风教”的吕本	(7)
第一节 吕氏宗脉 源远流长	(7)
第二节 致力仕途 位极人臣	(13)
第三节 造福家乡:“民不病徭,里不虞寇”	(25)
第四节 退居故里 吟赏风雅 优游山林	(28)
第三章 锦上添花:门庭赫奕的姻亲孙氏	(38)
第一节 吕本之子 宗脉相传 瓜瓞绵绵	(38)
第二节 勋阀世家 书香门第 望族联姻	(43)
第三节 孙鑑:“于古今剧戏,靡不贮存”	(48)
第四节 孙鑑、孙如法的戏曲活动与影响	(50)
第四章 克绍箕裘:有“天下士”之目的吕胤昌	(59)
第一节 吕本的孙辈	(59)
第二节 “簿书不减烟霞气,吏道能兼辞赋名”	(63)
第三节 翩翩仙郎 交游戏曲名家	(69)
第四节 吕胤昌在“汤沈之争”中的作用地位	(80)

第五章 终成名家:登上家族文化高峰的吕天成	(86)
第一节 “其于词学,故有渊源”	(86)
第二节 “舞象时即嗜曲,弱冠好填词”	(90)
第三节 《齐东绝倒》:“狎侮大贤,得罪名教”	(95)
第四节 诗文及小说创作:“摹写丽情褻语,尤称绝技”	(99)
第六章 铸就辉煌:《曲品》开创古代曲论新阶段	(105)
第一节 “举今昔传奇而甲乙”	(105)
第二节 “本色”、“当行”论与“合之双美”说	(108)
第三节 从“曲”的意识“到”剧”的观念	(111)
第四节 新的品曲标准对传统戏曲批评观念的突破	(116)
第七章 余波流响:吕氏后裔的戏曲活动	(118)
第一节 衣钵传承:吕师著、吕师濂延续家族文艺传统	(118)
第二节 绵延不坠 吕洪烈秉承家学	(126)
第八章 以曲传家: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	(132)
第一节 余姚腔的摇篮	(132)
第二节 “阳明心学”推波助澜	(136)
第三节 “吾越故有词派”	(139)
第四节 家族戏曲文化链的形成	(145)
附录一:明代余姚吕氏世系简图	(151)
附录二:明代余姚吕氏家族资料选辑	(152)
吕氏始祖祠记	徐 渭(152)
重修万十二府君墓志	吕 本(153)
明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公神道碑	袁 炜(154)
赠柱国少保武英殿大学士醉梦吕公墓志铭	袁 炜(155)
太傅吕文安公本传	汪道昆(157)
太傅吕文安公传	王世贞(161)
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期斋吕公墓志铭	李廷机(165)
李公生祠记	袁 炜(168)

世笃忠贞祠碑	吕 本(169)
寿伯姊吕太恭人七十序	孙 鏊(171)
大司马月峰孙公行状	吕胤昌(172)
玉绳答论诗文书	吕胤昌(173)
《荷华山房摘稿》跋	吕胤昌(175)
齐东绝倒	吕天成(176)
《曲品》自序	吕天成(187)
《曲品》卷上小序	吕天成(187)
《越园纪略》序	吕天成(189)
《义侠记》序	吕天成(189)
敕授江宁北捕通判吕师著墓表	毛奇龄(192)
《念八翻》序	吕洪烈(195)
主要参考文献	(197)
后 记	(200)

第一章 文献名邦:姚江人物甲天下

第一节 底蕴深厚的余姚历史文化环境

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襟海带江,南屏句余之山(唐代以后称为四明山),北濒钱塘湾,东接蛟门,西通曹娥,中有姚江,穿越余姚南北双城之间,东流入海。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使百里姚江成为长江流域文明源头,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有传说称五帝之一的舜帝即生于姚江边的姚邱山,故姓姚。这里也产生过“禹藏秘图”的神话。据传当年大禹疏河治水,姚江为其治理的九河之一,功成之后,大禹将治水秘图藏于名为方丈山的土丘之下,此山后人就改称为秘图山。秦始皇扫平六国后,分天下为36郡;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东巡入浙,分立浙东县境,建置余姚县。余姚之名裁取了句余山之“余”字及姚水之“姚”字,合称之为“余姚”。自此,屹立东南的余姚开始以其山川钟秀、地灵人杰著称于世。

西汉末年,余姚出了一位高士严子陵,如范仲淹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里赞颂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①,成为文人士心目中高风亮节之典范。东汉著名学人朱育曾问著名经学家、余姚人虞翻:“闻玉出昆山,珠生南海,远方异域,各生珍宝。且曾闻士人叹美贵邦,

^① 《范文正集》卷七。

旧多英俊,徒以远于京畿,含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宁识其人邪?”虞翻对答,包括余姚在内的会稽一带“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实为州镇,昔禹会群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系踵,孝子连闻,下及贤女,靡不育焉”^①。这番问答足可说明余姚自古以来人文业绩之辉煌。北宋谢景初继任余姚知县,赴任时好友范仲淹写诗送行:“余姚二山下,东南最名邑。烟水万人家,熙熙自翔集。”^②那时的余姚已经是世人心目中的“东南最名邑”。随着宋室南渡,赵氏皇族子弟及官宦世族纷纷卜居姚江两岸,宋人罗潜《宝庆四明志》中云:“高宗驻蹕吴山,明为甸畿,孝宗命元子保釐,礼俗日盛,家诗户书,科第取数既多,且间占首选,衣冠文物,甲于东南。”^③据统计,在余姚这样一个面积仅有1526.86平方公里的地方,宋代中进士者达135人,明代更达389人。

其实早在明代之前,余姚就久有文献名邦之誉。明成化年间余姚大学士谢迁的著作《归田稿》中有一篇《赠邑宰丘君以义被召之京序》^④,提到:“吾余姚以文献称久矣!而莅兹土者往往有畏难之色,岂文献足征之邦顾不若荒野鄙陋之地之易治乎?”序文中的“丘君”为邱养浩,正德十六年(1521)任余姚知县。从序文中所写“吾余姚以文献称久矣”看,余姚以文献名邦著称必然早于谢迁写序文之前。

明清时期,余姚更是“衣冠文献,益盛以大”。其中有创立阳明学说的王守仁,乃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有在日本传播汉学文化的朱舜水,对日本儒学的发展功勋卓著;有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深刻反思封建专制政体及其腐朽的思想体系,提出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政治见解,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清初五大师”。“清初五大师”余姚即占据其中之二,真可谓“姚江人物甲天下”。

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县康如珪修纂《余姚县志》,其中《学校志》卷首语云:“况姚土固文成乡也,其学术衣被天下,固首为文献之邦乎。”余姚为文献之邦正式见于地方志书。文献名邦指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硕儒辈出、文风郁盛之地。我国拥有“文献名邦”美誉的地方仅有五个:孔子的

① 《三国志·吴书·虞翻传》。

② 范仲淹:《送谢景初廷评宰余姚》,见《全宋诗》卷一六五。

③ 罗潜:《宝庆四明志》卷一《风俗》,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版。

④ 谢迁:《归田稿》卷二。

故里曲阜;孟子的故里邹县;明清时期特多会元和状元的苏州;宋绍圣年间曾称文献名邦的云南大理府;再一就是有古舜遗风的余姚。

慈溪人裘琬在《续姚江逸诗序》中说:“吾浙文献之盛,莫如姚江。其以理学、节义、勋名著者,自六朝迄有明,千百年间彪炳寰宇尚已。若夫诗,艺文之一事耳,能是三者,即骚雅吟咏稍逊他邦,宁即以是见少,而诸巨公乃必兼擅而后已。他姑无论,若虞永兴、王新建、谢文正、倪文忠、孙文恪、黄忠端,即第取诗与前人较,亦足凌铄千古,而其理学、节义、勋名又复卓卓如是。呜呼,天之生才实难,何独盛于姚也?!”^①惊叹于余姚的文献之盛。

90余年前,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给《余姚评论》的《复余姚评论社论邵二云学术》一信中也曾总结过余姚学者在明清学术中的地位:“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阳明千古大师,无论矣;朱舜水以孤忠羁客,开日本德川氏三百年太平之局;而黄氏自忠端以风节厉世,梨洲、晦木、主一兄弟父子为明清学术承先启后之重心;邵氏自鲁公、念鲁公以迄二云,间世崛起,绵传不绝。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生斯邦者,闻其风,汲其流。得其一绪则足以卓然自树立。”^②这段话更清晰地道出了余姚堪称“文献名邦”的原由和意义,而这其间,就已经涉及了文化望族对余姚成为“文献名邦”的贡献。

第二节 姚江望族 文化世家

家族或称宗族,是由血缘为纽带维系着的社会群体。^③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宗法意识的文明古国中,家族始终是传统社会的细胞,是构成社会的基层组织。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卷三《宗族》这样解释家族:“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流凑也。”唐代杜佑在《通典》卷七十三进一步阐释:“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道出了家族初始的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家族的内涵也愈加丰富。西周时,宗族关系已渗透到国家的政治、

① 《续姚江逸诗》,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0册。

② 梁启超:《饮冰室书话》,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页。

③ 徐扬杰:《中国家族制度史》序言,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东汉以后,更逐渐形成门阀世族的强大势力,并一直延续到唐代。科举制的诞生抑制了门阀世族的发展,在科举选官鼎盛的宋代,世家大族的长期兴盛主要通过家族成员不断地科举入仕来维系。所以与唐代望族多门阀士族不同,宋代望族多科举之家。而到了明代,文化家族作为社会转型的重要指标开始大量出现。文化家族的崛起固然也靠前辈在科举仕途上的作为,但保持家族长盛不衰、门风不坠、绵延久远,却并非因为世代簪缨,官宦富贵,而是得益于“诗书传家久”。其特征是一门风雅,重视家学,诗文书翰流布四方,累世不绝。

其实文化世家在余姚的出现绝非始自明代。作为姚江学术文化重要代表的虞氏家族,即起自东汉,虞光开余姚虞氏学术先声。三国时,以易学著称的虞翻树立了虞氏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虞翻的曾孙、东晋的虞喜发现了“天周”与“岁周”之差——“岁差”,早于西欧学者千余年,对后来的天文学家影响很大;其弟虞预是东晋著名史学家,著有《晋书》40卷,开当代人修当代史之风。隋唐时,虞世南不仅是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的唐初四大书法家之一,还是得力的政治家、著述丰富的学者,撰有《帝王略论》等各种著作100余卷。虞氏家族延续几百年,在史学、天文学、文学、书学等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将余姚虞氏列为会稽三大家族虞、孔、贺之首,是名副其实的“江左豪族”。

隋唐移都长安,国家政治文化中心西移,余姚所处的东南地区已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家族一度衰落。宋室南渡后,杭州成为都城,政治文化中心又迁到东南地区,宁波各地大家巨族渐兴,清代全祖望的《甬上族望表》曾排列有数十家,其中史氏、楼氏、丰氏、郑氏号称“宋四家”。史氏家族在南宋出过史浩、史弥远、史弥忠、史守之、史宇之、史嵩之等显贵;楼氏家族由北宋至南宋,有四明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楼郁、影响宁波水利格局的楼异、绘制著名的《耕织图》的楼璩、教育家楼钥、太学博士楼昉,大学者楼钥则留下了《攻媿集》、《玉海》等学术著作;丰氏家族由宋至明,出过丰稷、丰有俊、丰庆、丰熙、丰坊等才俊。还有宁波城南的袁氏家族,自宋至元,有袁燮、袁韶、袁甫、袁桷等官宦、学者,俊彦辈出,为世人所瞩目。

明中叶后,宁波经济更加繁荣富庶,万历《新修余姚县志》引用了嘉靖《余姚县志》中有关余姚风俗的记载:“好学笃志,尊师择友,诵弦之声相闻,下至穷乡僻户,耻不以诗书课其子弟,自农工商贾鲜不知章句者。家矜谱系,推门第品次甲乙,非其族类,即富贵不同婚姻。男子不事游猎,妇女躬

纺织，无交游，虽世缔姻戚，寡所识面。是故尊卑有仪，里族有施，士不钳忌，是故知耻。好修善让，俭而不陋，华而不费，勤而不匮，质而不俚，其忧深，其思远，非有虞氏之遗风，岂能若是。”^①当时的余姚风俗良好，人们尊师好学，讲究礼仪，重视门第，社会上士大夫众多，正是整个宁波地区的一个缩影。世家大族在宁波更为密集地出现。如余姚王氏家族（有王纲、王华及大儒王阳明等），鄞州杨氏家族（有杨守陈、杨守随、杨守趾、杨守隅、杨茂元“一门五进士”。其中杨守陈、杨守随、杨守趾兄弟成为同朝三尚书），江北屠氏家族（有屠濬、屠侨、屠大山、屠本峻、屠隆等），鄞州张氏家族（张时彻、张邦奇叔侄俩先后成为兵部尚书，在两浙文坛也堪称主盟者）。这些家族往往科第繁盛，敏于习文，人才辈出，一门风雅。

明末清初出现的竹桥黄氏家族，是姚邑乃至浙东的文化名家，代不乏人，不仅诞生了思想界巨匠、浙东史学派鼻祖、著名文学家黄宗羲，而且黄宗羲的父亲忠端公黄尊素，弟弟黄宗炎、黄宗会，儿子黄百家、黄炳昼等，在诸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当时余姚还有邵氏家族，自邵曾可、邵廷采以迄邵晋涵，学统不绝，以邵廷采声望最著，他学贯百科，尤以经史之学著称于世，著述丰厚，有《思复堂文集》。

余姚不愧为人文之渊薮，精英辈出，数不胜数。以上这些世家大族，有以忠义闻名，有以诗礼道德传家，有的既有文治也有武功，但多数以儒为业，家学主要集中在如哲学、史学、天文学、书学等经史之学与自然科学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并无专以文学艺术著称的家族。

在明代浙东的姚江之畔，却有着这样一个数代与戏曲结缘的家族——余姚吕氏家族。

明末浙江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起草的《康熙会稽志》“凡例”提到：“会稽与山阴，其界止一水，故邑之人，互置产弗问，互讼狱弗问，互考校弗问。且郡城为八邑之人所聚，多迁居焉。其姓之最著者，余姚之孙之王之吕之姜，上虞之徐之倪之李，嵊县之商，皆登山阴、会稽之版籍久矣。然孙忠烈、王新建、吕文安、姜宗伯、徐中丞、徐少司马、李忠丞、倪文正、商家宰，志在山、会者，未尝不志之原籍，比入府志，咸归一焉。”从明代后期起，吕氏不但在余姚与出过王阳明的王氏家族、出过孙燧的孙氏家族等齐名，而且在会稽与山阴都已是“姓之最著者”。清初浙江经学家、文学家毛奇龄也

^① 史树德修、杨文焕纂：《舆地志五·风俗》，见《新修余姚县志》（万历二十九年刊）卷五。

称：“姚江八族者，前四族为毛邵徐韩，而后四族则孙王并吕谢也，后四胜前四。”^①无论是“孙、王、吕、姜”，还是“孙、王、吕、谢”，吕氏之为姚江著姓望族，早有公论。

吕氏不仅是出过吕本(谥号文安)这样内阁大学士的大家巨族，而且是文化世家，其独特处便是在戏曲领域的作为。在中国历史上，一个家族的几代人都出过文学名家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三曹父子、杜审言杜甫祖孙、二晏、三苏，等等。但细究起来，这种家族文学传统多集中在诗词文领域，在戏曲这一新兴的文艺领域就极为罕见了。即便与吕氏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孙氏家族，其家族文化的重心也不在戏曲。

吕氏家族的成员遍布曲坛，如吕胤昌、吕天成、吕师著、吕师濂、吕洪烈，可谓家有名人、代有传人，呈现出群体繁荣的局面，是一个戏曲薪火相传不绝的地域性文化族群。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在这一家族成员中，对于吕天成的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集中于《曲品》研究，其他成员则尚未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所幸有徐朔方师《晚明曲家年谱》中《王骥德吕天成年谱(附孙如法吕胤昌)》一文珠玉在前，在年谱的体例下，最先对吕本、吕胤昌、吕天成等人的事迹分别作了梳理。另外杨惠玲的论文《晚明余姚孙氏、吕氏世家戏曲活动考述》^②，兼论孙、吕两家，对孙氏、吕氏家族成员的事行进行了概述，分别涉及孙鑣、孙如法、吕胤昌、吕天成等人的戏曲活动，基本仍停留在个体研究，未上升到对家族的系统研究，又以吕天成为主，占了论文6000字篇幅的一半多；对家族世系的认识也有混淆处，称“吕本晚寓东山醉梦窝，自号醉梦居士，博览群籍，通阴阳律吕”，把本该属于吕本父亲吕改的材料按在了吕本的身上。可以说，对吕氏家族的总体观照，基本仍是空白。

有鉴于此，笔者在参阅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个富有鲜明特色的戏曲世家基本资料的收集、梳理，以姚江文化为背景，以明代戏曲发展为参照，写成《明代余姚吕氏家族研究》一书，力图首次厘清其各代成员、婚姻、交游、创作等基本情况，进而挖掘其家族文化传统的成因及对明代戏曲界的独特贡献，并由此来呈现宁波这片古代文化沃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① 毛奇龄：《孙监州君墓志铭》，见《西河文集》“墓志铭”十六。

② 杨惠玲：《晚明余姚孙氏、吕氏世家戏曲活动考述》，见《艺海》2005年06期。

第二章 位极人臣：奠定“传家风教”的吕本

第一节 吕氏宗脉 源远流长

一、吕氏源流

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吕，一个古老的姓氏，源自姜姓。据司马迁《史记》中《齐太公世家》所记，吕氏始祖为吕尚，又称姜子牙，因辅佐武王灭纣有功，受封于齐。春秋时，齐国被楚国所灭，吕姓子孙星散，播迁频繁，分布广泛。徐渭在《吕氏始祖祠记》称：“吕世侯伯，自夏封太岳，周太公望封齐，入汉，以高后戚封侯者，亦多至二十余人，而霸晚最显。其后子孙，在魏有虔，在唐有延之。”^①其中的一支到唐代又发达起来，后裔人杰辈出，出则为将，入则为相。吕延之，开元二十二年（734）进士，封浙东道节度使，御史大夫。吕延之之子吕渭，乾元二年（759）进士，礼部侍郎兼左仆射。吕渭有四子，吕温、吕恭、吕俭、吕让。长子吕温，字和叔，官衡州刺史；吕温颇有文采，《旧唐书》称其文章“有左丘明、班固之风”，卒后，刘禹锡将其诗文辑为《吕衡州集》20卷，后

^① 《吕氏始祖祠记》，见《徐渭集》，第607页。

有《吕和叔文集》行世,《全唐诗》收其诗2卷百余首。根据《余姚吕氏宗谱》^①记载,吕渭次子吕恭,字敬叔,历任殿中侍御史、桂州防御使、岭南节度判官。吕恭传吕爽;吕爽传吕寿,景城主簿、恩赠右仆射。吕寿传吕兗,横海军节度判官,死主帅刘守文难,赠尚书右仆射。吕兗之子吕琦,字辉山,五代时人,生于幽州,天福年间任兵部侍郎,故称幽州天福侍郎一院,为廊坊吕氏先祖。

到宋代,吕氏已经成为声名显赫的世族大家,王铎叹之为“本朝冠族”^②,王珪亦称“天下之人谈衣冠之盛者,必以吕氏为世家”^③。其中吕蒙正、吕蒙正之侄吕夷简、吕夷简三子吕公著,祖孙三代为相;吕夷简的次子吕公弼官至枢密使,也是朝廷重臣。故而《宋史·吕夷简传》称其为“三世四人”。吕琦之子吕端,宋太宗时官拜参知政事。向上追溯,他们都是吕渭后人。南宋理学大家吕祖谦,也是吕渭后人。一门之中出如此多的名相重臣大儒,实为历代罕见。

吕琦生吕端,吕端生吕荀,荫补至国子博士,赠兵部侍郎。北宋著名的敢谏之臣御史中丞吕海是吕荀的儿子。北宋末年,吕海之子吕由诚,知袭庆府,被金兵围困城内。金人攻陷城池后,逼吕由诚投降,拒降则杀其子。吕由诚誓死不降,战死。七个儿子中吕偁、吕仍、吕偁、吕偁被害,其余三个因在外幸免,其中的吕傅,后居四川;吕倬迁居浙江东阳,为东阳吕氏一支始迁祖;吕亿,字大章,以父荫历官大理评事,南宋初年随皇室南渡,因和新昌袁姓女联姻,遂家新昌。吕姓“由青齐徙越新昌”,自山东青州迁居浙江新昌县,由吕亿始,后人遂尊吕亿为新昌吕姓的始迁祖。徐渭《吕氏始祖祠记》赞叹,自吕霸到吕亿,“凡兹十一公,一侯两相,上卿者四人,侍从出守者视之,噫盛矣”!

新昌吕姓的一世祖吕亿有三个儿子,长子吕集守父墓,居新昌磕山。根据《新昌吕氏宗谱》^④记载,吕集又名绍曾,赠都指挥使;后代为吕蒙,新昌“孝”字派;吕蒙传吕琰,封修织郎,后赠宣教郎。吕琰传吕宜之,乡贡进士,封初品官;吕宜之传吕暹,授郡马;吕暹传吕镰。正如徐渭在《吕氏始祖祠记》中所记:

① 吕铭纂修:《余姚吕氏宗谱》,光绪二十四年(1898)敬和堂活字本。

② 王铎:《默记》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③ 王珪:《吕谏议公绰墓志铭》,见《名臣碑传琬琰集》中编卷十五。

④ 吕锡时主修:《新昌吕氏宗谱》,清同治八年(1869)木活字本。

盖在赵宋有吕亿者，仕某宗朝为大理评事，扈辟而南，遂家新昌。七传而至镡，镡父某，尚宋福邸，官郡马。当其时，虏逼宋，且及戚畹，镡始图迁避之，不果。传珙，珙传贵义，虏果及，而始迁上虞之达溪。悦余姚山水，再迁余姚之新河，于是余姚有吕氏。

吕镡传吕珙，吕珙传贵义（《余姚吕氏宗谱》为“义贵”，有误），贵义迁余姚之新河。明代余姚吕氏的第一代，当属吕贵义。

二、余姚吕氏

吕贵义作为余姚吕氏的第一代，迁余姚新河的时间，大约在元末明初。徐渭《吕氏始祖祠记》称：“吕与李声相近也，高皇帝新立，用法严，当贵义公世，籍户口书，误易吕以李，及觉而籍已上，欲请更不敢，贵义用是缺然以终身。及簒，呼其子德玉诀曰：‘吾死，其令吕氏子孙世世著姓，生则从李而已，没仍吕。’”

明洪武初年更定图籍时，因为余姚方言中“吕”与“李”同音，登记户籍者错将“吕”听成了“李”，待吕贵义发现时，已经记录在册了。明初另有一吕本，与余姚吕本非同一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河北武安县进士，任过兵部给事中，在洪武辛未科进士榜中也误书为李本。还有吕坤（1536—1618），字叔简，著有《呻吟语》，万历二年（1574）进士，榜名也作“李坤”。吕坤自撰的《墓志铭》有记：“君元宋以前洛阳人，盖南渡之遗黎也。洪武元年迁宁陵，以军功传旨讹书‘李’，二百年不曾复，君始奏复。”吕坤先祖追随朱元璋军队，后因军功从洛阳迁到宁陵，御札误书姓李。直至吕坤任吏部主事，朝廷要封赠其父时，才奏复原姓。这诸多的“吕”、“李”之误已经不是巧合，而是说明“吕”、“李”二字读音实在相近。

当时法度严峻，吕贵义不敢擅请更改，只得将错就错，冒用李姓。而恢复吕姓也成了贵义一生的心病，却至死未能遂愿。

嘉靖十一年（1532）吕本进士及第，与他同登进士第的有邻近的绍兴府新昌县的吕光洵。吕光洵，字信卿，号沃洲，生于正德三年（1508），小吕本五岁，两人既是同年进士，又是绍兴同乡，甚是友善。其后两人都在朝中居要职，吕本任大学士，吕光洵任兵部尚书。嘉靖四十年（1561），吕本母亲亡故，他回家丁忧期间，在吕光洵那里看到了吕氏家谱，意外地发现其中记有自己的十世祖先万十二府君吕镡，吕镡的神道碑也存于新昌吕氏族庙，墓

则在新昌甘棠^①。于是吕本认定余姚吕氏出于新昌。

嘉靖壬戌(1562)六月,吕本作《重修万十二府君墓志》:

公新昌人,讳镰,字廉夫,行万十二。宋丞相端、御史中丞诲后也。祖讳宜之,父讳暹,理度时为福邸郡马,公盖福邸之外孙也。娶剡西光明塘王氏,早卒,以妹继之,生二子,长珙,次琮。以咸淳己巳,奉柩合葬于二十都仙桂乡甘棠之原。恭帝时,元兵入临安,福王与宋帝皆北行,宋宗戚大臣悉避祸他徙。珙徙上虞达溪,仍葬于新昌黄沙岙;琮溺死钱塘,有遗腹子名师贤,育于族叔。后自天台返新昌,始知公墓所在,世称百岁老人。生子升,有孝行,为国初名贤。升孙迪,首登乡荐,任连江教谕。玄孙献,由经魁举进士,历官南京兵部右侍郎,前以给事奉使安南,加一品服。珙子贵义,再徙余姚,传三世,为原实。国初入籍,误书“吕”为“李”,子孙因循。又四世而生本。本既贵,乃追所自出疏请复姓。时公墓为乡民赵氏所据,合宗党力讼于官,始复。乃树坊表墓,具始末纳圻中。嗟夫!公晦于身而大发于子孙,潜于二百载前而乃显于二百载后,岂非祖宗世传忠孝积累之报歟!^②

作为吕镰的十世孙,已经显贵的吕本以“疏请复姓”为己任,务必使祖宗复姓扬名。

《期斋吕先生集》还有嘉靖丁卯(1567)冬吕本为吕光洵亡父所作《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芝山吕公神道碑铭》,以及吕本为吕光洵亡弟所作《光禄寺署丞吕源卿暨配潘氏孺人合葬墓志铭》,也都提到了认祖复姓事:

公讳世良,字中遂,别号芝山,实四岳太公之裔,自宋时有讳亿者,官大理寺评事,自青徙居新昌,为新昌吕氏始祖,本亦由是出焉。^③

源卿吕君,赠兵部尚书芝山公之季子,兵部尚书沃洲、休宁训导易卿之弟也。与予同出于宋太师中书令正惠公其后讳亿者,南渡时自青徙新昌。予八世祖又自新昌徙余姚,冒李姓,不修族义者久之。及予与沃洲同举进士,甚善。……本念八世祖自新昌徙余姚,占籍时误以吕作李,久不通吉凶之问,未知所称。及岁辛酉,本丁太夫人忧归,吕氏见太夫人事状历叙所自来,乃发谱,考之有据。又本所谓十世祖万

① 万历《新昌县志》卷二“吕氏墓”条记有“余姚大学士吕本十世祖镰葬甘棠之原”。

② 《重修万十二府君墓志》,见《新昌吕氏宗谱》卷二“传志”。

③ 《赠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芝山吕公神道碑铭》,见《期斋吕先生集》卷十一。

十二府君者，祧主在吕祠壁室中。盖壁室藏祧，公所创也。谱牒既明，而主复无恙，天开之矣。本乃今知公在诸父行。癸亥冬，本诣新昌拜先人之墓，因与族之尊卑长少相序会，徘徊久之而后返。^①

嘉靖癸亥(1563)冬，吕本到新昌拜祖先、修墓，认祖归宗。其后与吕光洵兄弟相称，往来益频，吕本写有《赴新昌访大司马沃洲弟曹娥舟中言情二首》，中有“为念吾宗老兄弟，不辞风雨向江行”^②之句。

隆庆四年(1570)五月二十二日，吕本上疏请求复改原姓吕。《明穆宗实录》隆庆四年六月庚子载：“前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本奏复吕姓，从之。”^③汪道昆《太傅吕文安公本传》也记：“穆考即位，公请吕姓，反本以志不忘。属冢子谱大宗，躬修新昌万十二公、庚五公二墓凡，诸祖墓，各置祭田，葺别祖祠，改树王父墓。”^④

明立国初，政府出于防止逃籍以及控制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成员等需要，严格控制国人更改姓名。此后，在严加勘查的前提下，稍有变通。到隆庆三年(1569)，据《大明会典》载，则批准“京堂官奏复本姓者免行查勘准复”。此例一开，要求更名复姓者很多，王世贞《皇明盛事述》卷四“大臣复姓”条就记录了包括兵部尚书张经、大学士申时行等31位大臣复姓者，吕本也在其中。^⑤

所以，吕本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到新昌认祖归宗前，一直沿用李姓，之后，特别是奏请复姓恩准后，自然在一切书、记中改从吕姓。故而袁炜于嘉靖四十年(1561)所撰吕公墓志为《明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公神道碑》，仍称“李公”；而在吕本修的家谱里，此墓志被改作《明赠光禄大夫柱国少保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吕公神道碑》，由“李”而“吕”，因为吕本修家谱在隆庆四年(1570)，这一更改正反映出吕本改复原姓的历程。

余姚吕氏的第一代吕义贵，有二子：德玉、德实。德玉名璠，字德玉，后以字行。德玉有四子：原敬、原实、原达、原仁。原实字仕信，有四子，二、三子绝，存友谅、友直。友直字举之，有三子：公璿、公琮、公珍。公珍字至重，

① 《光禄寺署丞吕源卿暨配潘氏孺人合葬墓志铭》，见《期斋吕先生集》卷十一。

② 《赴新昌访大司马沃洲弟曹娥舟中言情二首》，见《期斋吕先生集》卷四。

③ 《明穆宗实录》卷四六，隆庆四年六月庚子，第1145页。

④ 《太傅吕文安公本传》，见《太函集》卷三九。

⑤ 王世贞：《皇明盛事述》，见《弇山堂别集》卷一。